

蘇聯國內戰爭 時期的兒童文學

勒·柯恩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82

K

416000

蘇聯國內戰爭 時期的兒童文學

• 勒·柯恩著 林學洪譯

書號 809 文藝 20

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兒童文學

著 者 [蘇聯] 勒 · 柯 恩

譯 者 林 學 洪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3/4

字數 32,000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5)一角七分

內 容 提 要

蘇聯國內戰爭時期，同時也是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時期。在接受文化遺產和創造蘇維埃文化的事業中，布爾什維克黨進行了改造知識分子的工作，對那些蓄意破壞文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反對並克服了隱藏在“純藝術”旗幟下的各種反動流派，以及那主張打倒一切舊文化的所謂“革新派”。在兒童文學中也進行了同樣的鬥爭。在黨的領導下，由於以高爾基為首的蘇維埃作家們的努力，肅清了各種反動流派對兒童文學的影響；在兒童文學中貫徹了黨性原則，奠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本書主要是結合當時的兒童讀物，對兒童文學的問題與情況予以具體的闡明與分析。

Л. КОН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3

在蘇維埃兒童文學的發展史上，正如在整個蘇維埃文化史上一樣，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的最初幾年，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時期。

當時，我國正在摧毀舊俄的國家機器和整個社會制度，全國捲入內戰並抗拒許多武裝干涉者的侵犯。就在這個時期，我國開始了一個空前的文化建設過程。

因此，要想了解任何一個文化部門（當然也包括我們所要論述的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進程，就必須很好地了解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我國文化上的種種演變。

列寧在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文中說，無產階級革命不同於資產階級革命之處，在於它負有建設的任務，他這樣說：「在以前資產階級革命中，勞動羣衆底主要任務，是在於實行消滅封建制度、帝制政體和中世紀關係這種消極的或破壞的工作……」

反之，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因而也在已由我們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進行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要任務，却是積極的工作或建設的工作……」〔1〕

從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天起，就在各方面開始了巨大的建設工作，其範圍不僅包括組織方面和經濟方面，而且也包括文化方面。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各項建設任務中，文化建設的任務也佔一個主要的地位。

沙皇統治遺留下來的沉重担子——人民羣衆的文盲現象，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嚴重障礙。各色的機會主義者都認爲這障礙無法克服，但是列寧對這個問題抱着不同的看法。列寧在論我國革命那篇札記中寫道：「如果說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相當的文化水準（雖然誰也不能說，這個相當的『文化水準』究竟怎樣），那我們爲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爭得造成這個水準的必要前提，然後就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走向前去追上其他各民族呢？」^[10]

開闢了人類歷史上新紀元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爲發展文化爭得了這種必要的前提。

蘇維埃政權當時的任務就在於，使社會主義革命所創造的可能性成爲現實，消滅文盲現象，使教育、文化和藝術成爲人民的財富。在這一時期，蘇維埃政權所頒布的一切關於文化教育的法令，正是以此爲目的的。

在革命勝利後的幾天之內，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舊曆），就成立了教育委員會，

由盧那察爾斯基擔任主席，展開了積極的活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舊曆），這個委員會頒布了一項公告，公告中說：蘇維埃政權「……決定於最短時期內，廣設合乎現代教育學要求的學校，實行免費的普及義務教育，通過這一途徑，達到人人識字……」（三）

此後又相繼頒布了關於實行新的簡化拼字法的法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關於國家與教會分立和學校脫離教會的法令（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關於男女合校的法令（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關於免費供給學生膳食的法令（一九一八年八月六日），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月頒布了統一勞動學校條例。

除了這些標誌整個學校制度的根本改造和旨在達到人人識字的法令之外，教育委員會以及後來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還發布了一系列關於促進人民一般文化水平的提高的決議。

這裏應該提到這樣一些措施，如：將一切書庫收歸地方公有（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宣布一切古典作家的著作爲人民財產，決定廣泛地、大量地出版這些著作並以廉價出售（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最後，根據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項專門決議成立了統一的國家出版社（一九一九年五月）。

還有一項法令也很可表現當時的特徵，這就是關於爲傑出的革命家、科學家、作家、美術家、作曲家、藝人建立紀念像，以使廣大人民羣衆了解其業績的法令。

列寧說過：「藝術屬於人民，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羣衆中扎下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爲勞動羣衆所了解和喜愛，它必須統一勞動羣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鼓舞他們。」〔一〕

把人類千百年來的文化所創造的一切最美好的東西變爲人民的財富，並在批判地接受這一文化的基礎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和新的、空前宏麗的、真正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藝術——這就是我們黨自始就抱定了的並一貫努力實現的目標。

學校的民主化和徹底改組很快就產生了效果。到了我們所論述的這個時期終了時（一九二〇——二一學年），儘管當時有種種困難，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城市學校網比一九一四——一五學年擴大了百分之二十七，而鄉村中等學校的數目則幾乎增加到三十倍。〔二〕

教育界的先進人士熱情地着手改造學校，尋求新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

這一時期的特點在於教育思想的蓬勃發展，討論新型學校的組織形式、教學方法和教育目標的各種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討論會的頻繁。僅在一九一八年一年就舉行了一百六十四次教師代表大會和八十一大人民教育局工作人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期間共召開了五十三次全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

藝術界和文學界也十分活躍。

當時成立了許多各種各樣的文學團體和創作協會，並且幾乎每個團體和協會都認爲應有

自己的機關刊物——雜誌或是報紙，不過這些刊物往往只出了頭一期或頭幾期就停刊了。設立了很多俱樂部、劇院，舉辦了各種民衆戲劇演出，展覽會和由作家、詩人主講的文學問題通俗講座。爲青年工人設立的文學小組和講習班遍佈各地。

人民羣衆迫切需要文化、藝術和教育，他們渴望識字和求得知識，熱切地要求表現自己的創造能力。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全俄教育會議上說過：「勞動者渴望知識，因爲知識是他們勝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勞動羣衆都認識到，知識是他們在解放鬥爭中的一種工具，他們之所以遇到挫折，是由於教育受得不够，現在全靠他們自己來使教育真正變成人人得而享受。他們從自身的經驗中，從自己的挫折和錯誤中得到教訓，他們認清了，教育對於勝利完成他們所進行的鬥爭是多麼必要。」〔8〕

俄國知識界優秀的代表人物立即站到革命方面來了，其中有：季米里亞席夫（他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就以學者、科學普及工作者、社會活動家和政論家的身份幫助蘇維埃政權）、儒科夫斯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成立的中央氣液體力學研究所的創辦人和領導人）、察普力金（儒科夫斯基的學生和戰友）、費爾斯曼（由於他在蘇維埃科學上的功績，一九二〇年他被選爲科學院院士）、偉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他在沙皇俄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從事園藝實

驗的隱士」，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却使他成爲一位羣衆的導師、天才的發明家喬爾可夫斯基等。

以高爾基、馬雅柯夫斯基、傑米揚·別德內依和綏拉菲莫維奇爲首的俄國許多傑出的作家，也立即站到革命方面來了。

爲了造福人民、造福祖國，他們努力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學識、經驗和才能。

要給羣衆以知識，要消滅文盲的禍害，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幫助，但絕不是知識界所有的人都能立時了解並接受革命的。

「舊時知識界中最有影響最熟練的一部分，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起，就已經脫離了其餘的知識分子羣衆，而向蘇維埃政權宣布鬥爭，並去做怠工者了。」〔七〕
列寧在對第一次全俄教育會議的參加者講話時曾經說過：

「怠工行爲比任何宣傳員，比我們的一切講演和小冊子都更清楚明白地表明了，這班人是把知識看做自己的專利品，把它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他們利用自己所受的教育來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公開地反對勞動羣衆。」〔八〕

二月革命後設立的國家人民教育委員會指導部和教員工會，即所謂全俄教師聯合會的領導分子正是採取了這種方式來活動的。國家人民教育委員會指導部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承認必須停止一切活動」。全俄教師聯合會的總理事會曾把一種「策略方案」發給各地的教師組織，唆使教師們公開違抗蘇維埃政權，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口頭的和文字的煽動工作，並實行罷教。

「舊知識界中的另一部分，即熟練程度較差而人數較多的一部分，很久還是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來臨，可是後來他們大概已感覺到沒有其他出路，便拋棄了自己的念頭，而決定來做供職的人，決定來和蘇維埃政權和睦相處。」〔2〕

黨進行了長期的、不懈的啓發教育工作，才克服了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對抗和動搖態度。

知識界還有第三部分人，「主要是其中的下層部分」，他們「和人民聯合起來擁護蘇維埃政權」〔10〕。

但是就連爲蘇維埃政權工作、盡力幫助它進行文化建設的那一部分知識分子，也絕不是一下子就了解黨的路綫的。

這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有很多人真正認爲，教育、學校、科學、藝術跟政治、跟階級鬥爭沒有絲毫關係。列寧在他對教師的講話中，曾屢次用具體的事實向這些「老實的迷途者」說明他們的錯誤。

大多數非黨知識分子，甚至同情革命的人，長期地認為，在文化領域內一切照舊不變，問題只在於怎樣在廣大人民羣衆中傳播這個舊文化，而不是怎樣批判地接受舊文化，創造新文化。

黨一方面耐心地向確實是誤入迷途的知識分子解釋他們的錯誤，同時，也對那些用無黨派和中立的假面具掩蓋自己、有意實行怠工並破壞文化建設的分子，進行了無情的、堅持不懈的鬥爭。

改造知識分子的過程在作家中間特別複雜。

有些作家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和布爾什維克黨有緊密的聯系，他們自始就站在革命方面。如高爾基、馬雅柯夫斯基、傑米揚·別德內依、綏拉菲莫維奇。同時，像布留索夫和布洛克這樣的作家，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就開始脫離象徵派（二）陣營，也站到革命一邊來了。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作家站在和革命敵對的陣營裏。很多人逃亡到國外去了。有的留在國內，則從事公開的或隱蔽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對它進行誹謗。還有的採取「中立」的立場，叫喊所謂「純藝術」的口號，宣傳藝術與政治無關、藝術超政治。

「純藝術」派宣傳藝術自由，說它不僅與政治無關，而且與任何社會理想、任何社會內

容也都無關。

各色的頹廢派〔三〕、象徵派、阿克米派〔四〕、幻想派〔五〕都聚集在「中立」、「無黨派」、「純藝術」的虛偽口號之下，以它爲幌子，來掩蓋其和革命不相容的敵對思想意識，來掩蓋其保持藝術爲少數人專有的、反人民的意圖。

從革命的最初日子起，極端急進的「革新派」也大肆活動，他們主張打倒和摧毀一切舊文化，並且以似乎很革命的詞句作爲掩護。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六〕的影響越來越大。無產階級文化派認爲，由於一切文化遺產都是人類在剝削制度時期創造的，所以都浸透了異己思想，因而和工人階級是敵對的，應當把它當作廢物而予以揚棄。他們主張「另起爐灶」，重新建設一個特殊的無產階級的文化，這種主張是和共產黨的方針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全部關於藝術的理論背道而馳的。

接受遺產的問題，是當時文化建設上基本問題之一。

共產黨向來都是把過去的遺產看做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出發點。這是以列寧的這個原理爲根據的：「在每個民族文化裏有兩種民族文化。有普列史克維支們的，古秩可夫們和司徒魯威們的大俄羅斯文化，——但也有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名字爲特徵的大俄羅斯文化」〔七〕，必須「善於區別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東西與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八〕。

蘇維埃政權自成立的時候起，就認為俄國偉大的古典作家們留給人民的寶貴遺產是「共產主義所必需的」。

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公布的一項法令，責成「……國家教育委員會通過它的文學出版處立即開展廣泛的出版工作」，其中指出，「首先應當出版俄國古典作家著作的廉價本」，並且宣布「根據本法令，他們的一切著述歸人民所有」。其次，它建議這種出版物的編輯部門選擇作品時「……除考慮其他條件外，須以各個作品接近勞動人民的程度為依據，因為這種普及本是以勞動人民為對象的」。最後，這個法令還作了這樣的指示：「古典著作的普及本應當按照成本發售，如果經費許可，應當按照優待價格售給，甚至贈送給為勞動羣衆服務的圖書館，以廣流傳。」〔2〕

執行這一法令的結果，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截至一九一九年五月止）出版了一百十五種（主要是選集）古典著作，總印數達六百萬冊，並且按照在當時是異常低廉的價格出售。

黨和蘇維埃政權，不顧各色敵人的陰謀和叫囂，堅決執行批判地接受文學遺產並將它普及於廣大人民羣衆的方針。

無論在保存文化遺產的鬥爭中，或在創造新文學的事業中，黨都受到兩方面的反對：受

到反動的知識界，特別是「純藝術」派的反對，也受到宣揚文化應脫離黨和革命鬥爭而獨立的「極端急進」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反對。

一九一九年無產階級文化第二次全俄理事會代表會議制定了這樣的綱領：

「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和創作組織，正如工人黨是它的政治組織，職工會是它的經濟組織一樣。」

顯然，無產階級文化派提出了這樣的綱領，說明它和革命的敵人毫無二致，革命的敵人就是把無產階級和黨對立起來，並且竭力企圖使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勞動人民相隔絕。

黨自然不能容忍無產階級文化協會這種立場，不能聽任他們在工人羣衆中宣傳這一類的思想。

一九二〇年十月，列寧爲無產階級文化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擬了一項決議草案，後來得到大會一致通過。關於對待文化遺產的態度問題，該決議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爲自己爭得了作爲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意識形態之全世界歷史的意義，是因爲馬克思主義並不把資產階級時代底最珍貴的成就完全拋棄，相反地，而是把人類思想及文化兩千年以上發展中的有價值的一切東西，加以攝取和改造。惟有在這種基礎以及在這個方向上的更進一步的工作，這種被作爲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後鬥爭的無產階級專政底實踐經驗所鼓舞的工作，才能

够被認為是真正無產階級文化底發展。」〔二〕

決議對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把自己與黨和蘇維埃政權對立起來的企圖，給了嚴厲的斥責。決議作了這樣的指示：「代表大會特以以下的絕對的義務，加在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一切組織底身上，這就是說，它們應把它們自己完全看成為教育人民委員部機關系統中之輔助機關，須在蘇維埃政權（特別是教育人民委員部）以及俄國共產黨底總的領導之下，來實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任務底一部分的自己的任務。」〔三〕

上面已經說過，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這個決議，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上層分子不願意服從這個決定，繼續執行自己的路線。

因此，黨不得不特別為此發出一個俄共（布）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通報。這個通報說：

「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產生於十月革命之前。它被宣布為工人的『獨立』的組織，不受克倫斯基〔三〕時期的教育部管轄。十月革命改變了形勢，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繼續保持其『獨立』，但現在却是對蘇維埃政權保持『獨立』。由於這一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大批我們社會的異己分子、小資產階級分子湧進了無產階級文化協會，這些人有時實際上攫取了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領導權。有些地方，未來派〔三〕、頹廢派、敵視馬列主義的

唯心哲學的信徒，乃至一般失意分子、從資產階級政論界和哲學界出身的人物，開始在無產階級文化協會裏把持一切。

「掛的是『無產階級文化』的羊頭，却向工人大賣其資產階級哲學觀點（馬赫主義〔註〕）的狗肉。而在藝術的領域中則向工人灌輸各種怪誕反常的趣味（未來主義）……」〔註〕

如上所述，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不僅反對批判地接受過去的文化遺產，並且不去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和藝術，却代之以一種成問題的「新創造」，這種「新創造」實質上也絕非完全都是新鮮的。

列寧在和克拉拉·蔡特金的談話中，對這種「革新」作了這樣的評語：

「我們為什麼要對一種真正美好的東西僅僅因為它是『舊的』就掉頭不顧，就加以擯棄，不肯把它當作進一步發展的起點？我們為什麼要崇拜新東西，把它奉若神明，僅僅因為『這是新的』，就要俯首聽命於它？真是荒謬，荒謬之極！這裏面有很多虛偽的成分，自然，也有點對西方流行的藝術風尚的不自覺的尊崇。我們是出色的革命者，但不知為什麼我們總覺得應向人證明：我們也趕得上現代文化的水平。我却敢於聲明自己是『野蠻人』。我不能認為表現主義〔註〕、未來主義、立體主義〔註〕和別的許多『主義』